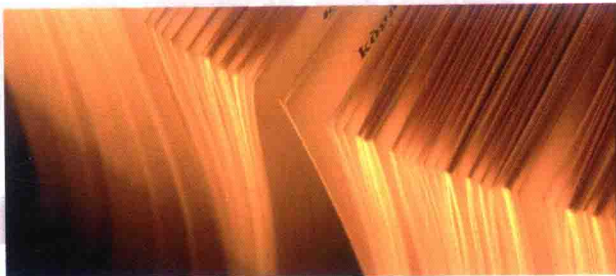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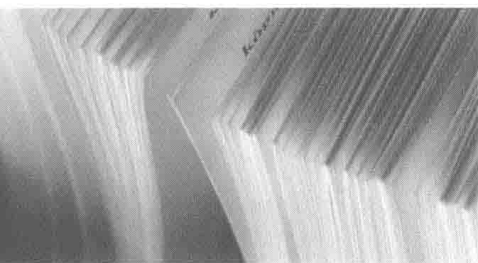
Jingshi
Tongwenguan
Waiyu
Jiaoyu Yanjiu

京师同文馆 外语教育研究

张美平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京师同文馆 外语教育研究

张美平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师同文馆外语教育研究 / 张美平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308-17247-9

I. ①京… II. ①张…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7567 号

京师同文馆外语教育研究

张美平 著

责任编辑 蔡圆圆

责任校对 杨利军 李增基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57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247-9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绪 论 学术史回顾	1
第一章 “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同文馆的创办缘由及沿革	38
第一节 同文馆的创办背景	40
第二节 同文馆的创办经过与沿革	75
第二章 “在馆课读,朝夕无间”:同文馆的教习	82
第一节 同文馆洋教习的招选及特点	83
第二节 同文馆汉教习的招选及特点	113
第三节 同文馆教习的贡献	123
第三章 “派充翻译之选”:同文馆的学生	127
第一节 同文馆招生管理模式	128
第二节 同文馆待遇管理模式	143
第三节 同文馆作息考勤管理模式	147
第四节 同文馆学习及考核奖惩管理模式	150
第四章 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系统和组织形式	161
第一节 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系统	162
第二节 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	184
第五章 “由洋文而及诸学”:同文馆的课程与教学	204
第一节 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及特点	205
第二节 同文馆以翻译实践为特色的教学	219
第六章 同文馆的重大转折:最高决策层的中学西学之争	248
第一节 同文馆中学西学之争的背景	249
第二节 同文馆中学西学之争的过程	256

第三节 同文馆中学西学之争的影响·····	269
第七章 “兼理译书,未免事属分外”:同文馆的西学翻译·····	279
第一节 同文馆西学翻译的背景·····	280
第二节 同文馆西学翻译的过程·····	287
第三节 同文馆西学翻译的影响·····	316
第八章 “西学东渐,国人讲求异邦文言,此为嚆矢”:同文馆的成就及影响 ·····	330
第一节 同文馆的成就及影响·····	331
第二节 同文馆外语教育经验及其当下启示·····	366
附 录·····	389
参考文献·····	397
索 引·····	416

绪论 学术史回顾

一、问题缘起

教育是一项以人为核心的事业,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从而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育现代化又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育现代化在提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向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传递中国声音方面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放眼世界,那些走在现代化前列的国家,大多是重视外语教育现代化的国家。道理很简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要发展,要进步,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需要“走出去”和“请进来”。在保卫国家安全,引进国外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承担国际义务和进行国际合作,构建本国国际话语体系,“以多层次对外话语阐释中国价值观念”^①等活动中,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媒介。正因为此,自19世纪中叶以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开明士大夫启动了以创办外语学堂为重要内容之一的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②,开始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现象,它发端于14、15世纪的西欧^③,其最初的启动力

① 吴学琴:《以多层次对外话语阐释中国价值观念》,《光明日报》,2015年7月2日。

② 所谓“洋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的《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有较完整的定义:“讲制造也,则曰必精算学;言交涉也,则曰必通语言;办教案也,则曰必谙外交;言通商也,则必曰通商情,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之以一名词,曰洋务。”[《国民日报汇编》(第三集·社说),东大陆图专译印局1903年版,第33页]上述内容大致涵盖了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③ 钱乘旦:《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2016年7月6日。

量来自社会内部,有学者称之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①或曰“内源性”现代化^②。“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背景与传统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外来的异质文明的撞击下产生的,是被动进行的,即所谓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或曰“外源性”现代化。这一类型的现代化大多发生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这一模式中,工业化是基础、核心与动力,但在中国、日本等汉字文化圈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一模式中,现代化启动的先决条件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素质能力、行为方式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变得越来越重要,正逐渐取代家庭、社区或职业群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③。“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更是终极目的。”^④所以,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引起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而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是教育现代化。有论者指出,“工业化始终有赖于思想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转变为其开辟道路……事实上,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先导与关键,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⑤。

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双重后果,一是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二是促成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谋求国家独立,中国人民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探索历程。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初目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具体实践是启动在教育、外交、军工和民用技术、商贸等领域效仿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局部地区实施迥异于传统古典人文教育的近代新式教育。所谓新式教育,是指近代以来产生的不同于传统的官学、书院和私塾教育。新式教育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开展的教会教育;二是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各类洋务学堂实施的外文、军事技术和科技实业教育;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维新运动和兴学高潮中涌现的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的教育。

① 孙立平:《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3页。

③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5页。

④ 田芝健、许益军等:《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光明日报》,2013年1月28日。

⑤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新式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校聘用外籍人士担任教习或主持校务工作,把近代西方的教育内容、思想和方法移植于中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作为“舶来品”和“外来者”的近代新式教育则以外国语文学堂的出现肇其端:自同治元年(1862)开始,奕訢、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士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台湾、新疆等地相继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等七八所外国语文学堂。这些学堂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开路先锋。奕訢等人通过学堂这一集教学、翻译与出版为一体的传媒机构,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成就,在相当一部分官员、士绅和普通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1886—1964)在其回忆录《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中说:“现代思潮从欧美涌到后,中国才开始现代化。”^①现代思潮涌到中国的重要媒介即是近代创办的新式学堂,即外语教育家张正东所说的近代外语教育之兴起的两个源头:一个是西方传教士想在中国传教,用基督教文化影响中国文化,为了培植传教的环境和帮手而创办的教会学校;另一个是清政府、民间为了解决“洋务”问题而设置学习外语的学校,这类学校的规范模式是京师同文馆。^②特别是京师同文馆(以下简称同文馆),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外交官、军政要员、学堂教习、科技工作者等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各类人才。可以说,不了解同文馆外语教育的历史,就难以了解中国外语教育史;不了解中国外语教育史,就难以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教育现代化乃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因此,同文馆开展的外语教育活动是永远绕不过去的课题。

自19世纪60年代以迄当下150余年的时间里,各界对同文馆的办学实践都非常关注。同文馆教学、管理等多个层面的参与者、中外研究者以及关注同文馆教育的其他相关人士,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中外文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同文馆的介绍与专题研究,有的研究者还公开出版了相关的论著。还有部分同文馆教育活动的参与者撰写的日记、回忆录以及在与家人的通信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同文馆。在现有对同文馆的介绍与研究中,大多数与同文馆外语教育有关,其中部分成果的质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然而,这些成果

① 蒋梦麟:《西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第489页。

② 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在史料爬梳、理论分析和研究视野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好似散落一地、需要打磨的珍珠,没有串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链条,难以让人窥见这一时期同文馆外语教育的全貌。

学问与实际脱节,知识与生产脱节,学习与创造脱节,这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产生的弊端。重视学用结合的同文馆外语教育实际上是对以猎取功名、登途入仕为唯一宗旨的传统教育制度的一种反动。同文馆外语教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先驱者的不懈努力,值得后人尊敬。其成败得失,都是宝贵的历史借鉴。当代外语教育中的许多理论、制度、课程及管理等问题,直接间接都和同文馆有着传承、衔接和扬弃关系。而且,当代外语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传统外语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反思与回归”^①。因此,梳理和研究同文馆外语教育这份遗产,发掘其底蕴,洞见其本源,就比任何时候都来得必要和迫切。它不仅具有充实和加强晚清外语教育研究的学理价值,而且具有推进和加强中国外语教育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二、学术史的回顾及问题所在

为方便讨论,我们拟将同文馆外语教育的研究史分为 1866 年至 1949 年和 1950 年至 2015 年两个时期。

(一) 1866—1949 年的研究概况

1866 年 3 月 31 日,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清政府首次派往欧洲访问的使团负责人斌椿及其从事翻译见习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三人的相关情况^②,这是笔者所见的最早提及与同文馆教学有关的文献资料。1870 年 1 月 25 日,《北华捷报》刊登了时任同文馆英文教习额伯连(M. J. O'Brien)的一封来信。这封题为“北京同文馆”(*The Peking College*)的来信详尽介绍了同文馆存在的招生困难、学生无心向学、教习素质参差不齐、总理衙门越权管理等多方面的情况。^③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封约 7000 字的长信很可能是最早见诸公开出版物的讨论早期同文馆外语教育的专题文章。同年 4 月 4 日,《北华捷报》发表了同文馆法文教习李壁谐(Emile Lépissier)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在这封以

① 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 页。

② *The N. C. Herald and S. C. & C. Gazette*, Mar. 31, 1866, p. 50.

③ *The N. C. Herald and S. C. & C. Gazette*, Jan. 25, 1870, pp. 63-66.

法文撰写的约 2500 字的信件里,李璧谐对同文馆管理者粗暴的衙门作风及外籍教习和学生没有受到公平对待等表示了极度不满。^①虽然额、李二氏的信函不是研究性论文,只是对同文馆存在问题的介绍和看法,但这是同文馆一线教师的所见所闻及其感想,真实性强,是了解早期同文馆外语教育活动极其珍贵的史料。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几乎未利用过这两份珍贵史料。1872 年 8 月 31 日,《北华捷报》发表《中国在进步中》(*Progress in China*)一文,跟额伯连等人两年前的来信不同的是,该文正面介绍了同文馆,指出该馆在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的领导下,不再是无足轻重,而是一所正走出困境,拥有近百名来自大清帝国各地学生的“大有希望的学校”^②。但该文介绍同文馆的内容很有限。

原同文馆英文和科学教习丁韪良自 1869 年执掌同文馆总教务后,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口碑。时任江南制造局专职翻译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在其主编的《教会新报》(1868—1874)上对丁氏做出了高度评价:“大美国丁韪良先生,泰西通儒也,来中土多年,深通华言文字。近年教习京师同文馆,著有《格物入门》等书,所论水火、汽电、力算诸学,言简意赅,确有精理,无一凿空,不独扩见闻,且多裨于民生日用者,诚格物穷理之名言,足可宝贵。”^③这可能是最早专门介绍同文馆教习的史料。

1880 年 1 月 29 日,《北华捷报》发表同文馆原英文教习傅兰雅(John Fryer)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 Shanghai*)一文。文章提及丁韪良和他的助手们“出版了各类广受欢迎,且被证明为对政府有用的格致和公法书籍。这些译作的水平极高,官绅学士皆欲先睹为快。……约有五六位西教习翻译了不少格致书籍,他们必定为华人所推崇,成为师表”。除丁韪良以外,傅兰雅还提及时任同文馆教习的数学家、翻译家李善兰等人翻译西学书籍,称李氏“格致等学无不通晓”,“中国像他这样有才具者极为稀少”。^④这是较早提及同文馆教习从事翻译的史料。

① *The N. C. Herald and S. C. & C. Gazette*, Apr. 4, 1870, pp. 244-245.

② *The N. C. Herald and S. C. & C. Gazette*, Aug. 31, 1872, p. 168.

③ 佚名:《华友送来此说》//林乐知主编:《教会新报》,台湾京东书局影印,1968年,第9页。

④ John Fryer, *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 Shanghai*. *The N. C. Herald and S. C. & C. Gazette*, Jan. 29, 1880, p. 81, p. 78.

1887年7月,美国著名传教士李安德(Rev. L. W. Pilcher)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发表《中国新教育》(*The New Education in China*)一文称,学习外国语言,接触西方文学,从而使政府知晓外国的风俗、惯例及当今世界发生的大事等一系列优势促成了同文馆的诞生。他还提及因新思想的引进、新教育的发展而导致洋务派与保守派的思想交锋,即著名的同文馆之争。^①

1900年,丁韪良的英文自传《在华六十年的回忆》(*A Cycle of Cathay*)出版。虽然与同文馆有关的内容仅占全书的约10%,但这是介绍同文馆外语教育最详尽的文献之一。该书最早由丁韪良口译、赵受恒笔述,以“花甲忆记”源头之名于宣统二年(1910)在上海出版。著名学人沈弘等人对该书进行了重译,取名“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于2004年出版。丁韪良在书中回顾了他在华六十余年的传教和办学历程,该书第二部分的第六、第七章专门讨论同文馆的办学情况。其中,对其接手同文馆的原因、教习、学生、课堂教学、译书、外事活动等均有较详尽的记述和思考。^②

1907年,丁韪良发表《同文馆》(*The Tungwen College*)一文,对同文馆的发展历程作了简要介绍。该文收录在原同文馆英文教习马士(Hosea 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一书的附录中。^③傅任敢将丁韪良的*A Cycle of Cathay*中有关“同文馆”的部分和马士书中的*The Tungwen College*进行节译,合成《同文馆记》,发表在1937年出版的《教育杂志》上。^④《同文馆记》成为后来的研究者频繁引用的重要文献。丁韪良的上述成果虽略有自我标榜之嫌,但由于丁氏系同文馆教学与管理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和一线教师,真实性较强。

这一时期,中国本土学者对同文馆也有少量介绍。1890年,《万国公报》

① Rev. L. W. Pilcher. The New Education in China(I). *The Chinese Recorder*, Jul., 1889, pp. 308-309.

②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New York, 1900, pp. 293-327. 中文参见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221页。

③ W. A. P. Martin. *The Tungwen College* in Hosea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ume I)*. Kent, UK: Global Oriental Ltd., 2008, pp. 471-478.

④ W. A. P. Martin 著,傅任敢译:《同文馆记》,《教育杂志》1937年第二十七卷第四号,第215-231页。

刊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先生纪略》一文。该文可能是国内最早介绍同文馆教习的文章。是年5月,丁韪良回国,同文馆师生为之饯行并献颂词,称学堂人才辈出,赖总教习分门析类,督课有方,以致馆务日有起色,详译西国各种书籍,皆精深宏实。其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或奉差出洋,或充各埠领事,或在各省机器局、学堂当差。^①颂词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至少说明丁韪良对同文馆的发展是很有贡献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著名保皇人士、被林语堂称为“铮铮之怪杰”的辜鸿铭(1857—1928)却以嘲讽的口吻言及同文馆:“同文馆,一个旨在使中国青年接受充分教育的学院……对于这个未来中国赖以拯救的极其重要的教育机构,赫德爵士不是选派第一流的学者、绝对胜任的人来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个私人朋友、一个美国前传教士担任总教习。这样,本该成为中华民族的曙光、启蒙和‘扩展’之源的同文馆,却被变成了一个收容贫苦、饥饿和无用青年的二流食宿学校。”^②辜氏的评论不乏现实依据,但他对同文馆是在怎样的艰难环境下蹒跚起步的现实却充耳不闻,有失公允。

民国以降,中外学者对同文馆的介绍和研究依旧很少。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是追忆丁韪良和对同文馆做总体介绍。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家中去世。是月30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在《北华捷报》发表了《缅怀已故丁韪良博士》(*The Late Dr. W. A. P. Martin*)的纪念文章,对丁氏给予了高度评价:“丁韪良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他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所有的人。他是介绍国际法和科学,引起中国政府关注的先驱,也是使中国政府接受西学的先驱。他创办的训练驻外公使和大使的学校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在秉性迟钝的中国人和满洲守旧派身上开了一个通向外界的口子。在这一方面,丁韪良的影响最强大,也最持久!……他在京师同文馆以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这一具有影响力的职位上长期任职,给中国留下了持久的印记。”^③其实,在丁韪良所处的晚清时代,赫德(Robert Hart)、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外籍人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未必就比他逊色。不过,明恩溥对丁氏的评价基本中肯,即便有所拔高,当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1917年2月,明恩溥发表《丁韪良博士生平》(*The Life and Work*

① 林乐知主编:《万国公报》,上海墨海书局1890年版,第11297页。

② 辜鸿铭著,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③ Arthur Smith. *The Late Dr. W. A. P. Martin*. *The North-China Herald*, Dec. 30, 1916, p. 715.

of the Late Dr. W. A. P. Martin)一文,对丁韪良在华六十余年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回顾。此文较其先前发表的《缅怀已故丁韪良博士》更为详尽,着重介绍丁韪良的西书译介及其影响、教育活动及丁氏在中外政治、外交、教育界所产生的影响。^①同年4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校友会季刊》(*Indiana University Alumni Quarterly*)刊登了时任国务卿福斯特(John Foster)以校友身份撰写的题为“感谢丁韪良博士”(An Appreciation of Dr. W. A. P. Martin)的文章。福斯特盛赞丁韪良在中国的教育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他说,在发生“拳乱”之前的这一代人中,他和清廷总税务司赫德足以称得上是“在中国的最杰出、最能干的外国人(the most distinguished and useful foreigner in China)”。^②晚清时期,丁韪良和赫德皆长期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但二者对中国影响的领域不同,前者主要在文化教育领域,后者帮助清廷管理海关。赫德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影响较大,而且,对同文馆的运行与发展也颇有贡献,举凡办学经费、教习聘用、教学管理等方面都要施以援手,被丁韪良称为“同文馆之父”。^③

1932年,外交家、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在《政治学报》发表《国际公法输入中国之起始》一文,对丁韪良翻译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国际法专著《万国公法》作了考察,认为国际法的输入缘于丁氏1863年翻译、次年出版的《万国公法》,它“影响其维新事业甚巨。……不但裨益了中国的‘洋务’,而且影响了日本的维新”^④。这是最早讨论国际法翻译的文献之一。1939年,李抱宏发表文章,认为国际法输入中国并应用于外交,始于1839年林则徐翻译滑达尔(Emeric de Vattel)的国际法著作。^⑤1933年,《读书月刊》发表了吴宣易的《京师同文馆略史》。吴氏认为同文馆有三大贡献。一是外交方面的。“自此以后,同文馆的学生,在中国外交上,一天一天的占着地位了。”二是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同文馆是“中国新教育的胚胎,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队”。正是有了同文馆,“中国的学生才正式接受西洋的语言文字和各种的新科学”。三

^① Arthur Smith.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Late Dr. W. A. P. Martin. *The Chinese Recorder*, Feb., 1917, pp. 116-123.

^② John Foster. An Appreciation of Dr. W. A. P. Martin. *Indiana University Alumni Quarterly*, Vol. IV, No. 2, Apr., 1917, p. 134.

^③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0, p. 293.

^④ 蒋廷黻:《国际公法输入中国之起始》,《政治学报》,1932年,第62、64页。

^⑤ 李抱宏:《国际公法之初次输入中国问题》,《外交研究》1939年第6期。

是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同文馆学生“练习翻译外国的书籍,并设立印刷局……于是译书渐多,同时教习方面也有所编译。由此可见同文馆对于西洋学术的介绍,也很有贡献”^①。这是这一时期质量最高的研究同文馆的成果之一,但这是一篇对同文馆评好的论文,未提及同文馆办学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失误,似有不足。

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亚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专家,于1945—1946年任美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他著有 *The T'ung Wen Kuan* 一文,于1934年在英文季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② 中译文《同文馆考》于翌年分别在《外交月报》(徐绍昌译)和《中华教育界》(傅任敢译)上发表。^③ 毕乃德认为,同文馆是“中国教育制度中渗入现代观念的急先锋”。其创办之目的“本在传习外国文字”,结果在“前后四十年中,它却按着近代的办法,给了学生们一种广博的训练,为中国政府造就一批翻译和外交人员”。^④ 从同文馆的发展轨迹看,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也是一篇对同文馆评好的文献。

1936年出版的《春冰室野乘》专门提及医学教习德贞、天文和化学教习欧礼斐等人。如介绍德贞云:“德贞者,英人也,精于医,为人裨阖,有机智。……于丁(颋良)为莫逆之交,丁乃援之入同文馆,充医学教习。”而对欧礼斐则流露出明显的蔑视:“实则欧于普通学外诸科学未谙门径……则英文外一无所知也。”^⑤ 这应该是作者的偏见,因为欧氏早年毕业于爱尔兰皇后大学(Queen's College, Belfast, Ireland),获硕士学位。^⑥ 设若真的不学无术,赫德是不会将其介绍给同文馆的,清廷也不会让他为同文馆服务26年,更不会在丁颋良去职后,让他接替总教习一职。

综上,清末至民国时期对同文馆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从数量看,成果很有限,且外籍人士的成果多于中国本土学者,而外籍人士中又以美国人居多,

① 吴宣易:《京师同文馆略史》,《读书月刊》1933年第二卷第四号,第10-13页。

② Knight Biggerstaff. *The T'ung Wen Kua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34(18), pp. 307-340.

③ 毕乃德著,徐绍昌译:《同文馆考》,《外交月报》1935年第六卷,第109-124页;毕乃德著,傅任敢译:《同文馆考》,《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第13-26页。

④ 毕乃德著,傅任敢译:《同文馆考》,《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第13页。

⑤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民国二十五年(1936),陕西通志馆印,第390、392页。

⑥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0, p. 311.

这可能与同文馆主要负责人丁韪良的祖国是美国这一点有关。从方法上看,以一般性的介绍为主,堪称研究性的成果很少。从内容上看,对总教习丁韪良的介绍占了较大的比例。这说明丁韪良确实是很有影响与贡献的同文馆领导人,在中外学界或政治外交界均享有较大的知名度。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以额伯连(1870)、丁韪良(1900)、蒋廷黻(1932)、吴宣易(1933)和毕乃德(1934)等为代表,这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影响较大的学术成果,至今仍在不断被引用。

(二)1950—2015 年的研究概况

我们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史分为两个阶段,1950—1989 年为第一阶段^①,1990—2015 为第二阶段。

1. 1950—1989 年的研究概况

1950 年,曾在旧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魏尔特(Stanley Wright)的专著《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问世。该书第 12 章专门讨论了同文馆与方根拔案件。本章前半部分介绍赫德率同文馆学生赴欧洲翻译见习、为同文馆选聘外籍教习及同文馆在培养译员方面的成就等;后半部分讨论该馆天文教习方根拔(未正式就任)与赫德对簿公堂的事件。作者肯定了同文馆的成就,称其毕业生取得的杰出成就有力回应了“帝国海关在过去四十年里没有训练出一位在现政府中服务的高级官员的指控”^②。由于作者聚焦的中心不在同文馆,故其讨论的内容很有限。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Ssu-yü Teng)和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于 1954 年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是中国 1839—1923 年间部分官方文献汇编的英译并附有相关情况的分析和介绍,其中涉及同文馆之争等相关内容。^③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Tsuen-Hsuei Tsien)的《近世译书对中国的影响》(*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一文于 1954 年发表在《远东季刊》

^① 我们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极其封闭的状态,凡是与外国有关的一切都被视为禁区。由于中美交恶,由美人丁韪良主政的同文馆更是成了禁区,相关研究极其缺乏。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陆续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面世,但直至 80 年代末有影响的成果依然不多。

^②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Wm. Mullin & Son (Publishers) Ltd., 1950, pp. 322-348.

^③ Ssu-yü Teng,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73-78.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上,对丁韪良和同文馆译书均有简略介绍。^①1961年,毕乃德的力作《近代中国最早的官办学校》(*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在康奈尔大学出版。该书对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上海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的办学情况作了较详尽的介绍与分析。其中关于同文馆的部分是以他于1934年发表的 *The T'ung Wen Kuan* 一文为基础进行修订和扩充而成。一直以来,和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一样,该书是有关同文馆研究的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著作之一,也是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必读书之一,其作者是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的奠基人,和费正清等人同属第一代留学中国的著名美籍学者。其引用的文献,很多是稀见史料,如当事人的日记、信件及美国国务院的原始档案等。作者认为,同文馆“从未像外人丁韪良、赫德以及中国的创办人恭亲王、文祥等人所期许的那样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十九世纪的一个不利于知识学习的氛围中,就这样一个非正统的教育机构而言,要承担大的教育角色是不大可能的。在遭遇绝大多数的主宰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士大夫反对,甚至鄙视的情况下,要想招收优质生源是很困难的,将毕业生安置在重要岗位也面临不少困难”。但同文馆“并没有完全失败”,它给中国提供了新式的外交人员,它几乎与中国外交机构的发展保持同步。同文馆为自己和其他官办学校提供了师资。通过其毕业生和出版物,新的思想得到了传播。最终它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样本,后者在以后二十年里成为划时代的强有力的文化复兴中心。^②这种“一分为二”的态度是可取的。但应该看到,诸如学生、教习、课堂教学、译书以及利弊分析等方面都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自1978年开始,费正清主编的洋洋15卷《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陆续出版。其中,与同文馆有直接关联的是第10卷(第一部)的第10章“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作者对同文馆的师资选聘、学生的招考和出路及同文馆之争的过程等均有简要介绍。^③

自清末以迄当下,丁韪良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一直是学界关注的

① Tsuen-Hsuei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May, 1954, p. 316. 该文的中译文《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戴文伯译)载于《文献》1986年第2期,第187-188页。

②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52-153.

③ Self-strengthening: 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 John K.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525-532.